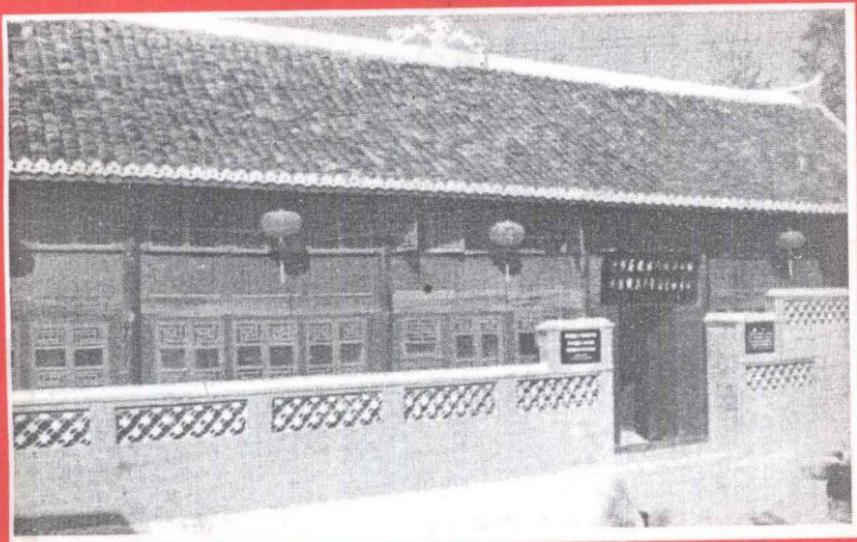


主观意志 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中共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毕节地区党史资料丛书之十九

主观意志 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谨以此书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
毕节地区各县市解放五十周年
迎接澳门回归和新世纪到来

献礼

中共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 编著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审 稿:地委党史领导小组成员;
各县(市)委;
各县(市)委党史研究室;
谢正发 甘德富 赵国洪

编 委:谢正发 马敏进 潘圣群 甘德富 赵国洪
范建中

主 编:谢正发

副 主 编:甘德富

责任编辑:赵国洪 范建中

编 辑:彭恩权 林勇

校 对:肖会明 姜秀卫 王云霞 彭恩权 甘祖娟
谢乾毅

前　　言

值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周年、毕节地区各县市解放 50 周年、澳门回归祖国怀抱和迎接 21 世纪到来之际，我们在地委、行署及各县市委、政府的领导和关怀重视下，收集、整理和编纂了《主观意志必须遵循客观规律》这本党史资料丛书，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50 年周年，毕节地区各县市解放 50 周年、澳门回归祖国和新世纪的到来献礼。

1958 年，中国大地上发生了一场史称“大跃进”的以超英赶美为目标，以追求经济建设高速度、高指标为内容的全国范围内持续三年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这次运动是我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和失误，是“左”的思想指导下急躁冒进的产物。运动的指导思想，即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大跃进”运动是贯彻这条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的产物，也是对这条总路线正确与否的一次实践检验。“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 年至 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损失。

《主观意志必须遵循客观规律》一书以历史时间或事件发生的先后为序,客观地回顾了“大跃进”运动中毕节地区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以冲天的革命干劲,开展以兴修水利、积肥、造林、除“四害”等四大运动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跃进运动,以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工业生产跃进运动,以及技术革新、生产工具改良运动、商业、教育跃进运动等一系列“跃进”的历史全貌,追述了“大跃进”运动给我区政治、经济、文化造成重大影响和损失。全书从正面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着手,既有客观真实又有具体分析,夹叙夹议,力求在记叙历史本然的同时,又实事求是地弄清历史的所以然,从而使全区广大干部群众从活生生的历史中进一步认识到:任何违背客观规律的主观蛮干都必然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时光荏苒;“大跃进”运动已过去 40 年,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我们已进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并将进入新世纪。我们把这段历史作为史料再现,旨在使全区广大干部群众,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能够在“毕节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的建设事业中有所借鉴和启迪。

编 者
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八日

目 录

前 言

一、综 述

- (一)主观意志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地委党史研究室(1)
(二)急躁冒进的教训 毕节市委党史研究室(26)
(三)经济建设组织者应具备科学思路 大方县委党史研究室(35)
(四)蛮干不可能促进经济发展 黔西县委党史研究室(41)
(五)切忌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 金沙县委党史研究室(48)
(六)前车之鉴可为师 织金县委党史研究室(57)
(七)欲速则不达——实践的结论 纳雍县委党史研究室(65)
(八)历史,曲折地前进 威宁县委党史研究室(77)
(九)革命热情必须寓于科学态度 赫章县委党史研究室(90)

二、专 题

- (一)“大锅饭”的始末 张 锐(98)
(二)在“大炼钢铁”中应吸取的教训 杨顺荣(102)
(三)对于劲冲天的群众必须进行正确的引导 方延厚(107)

三、回忆录

- (一)地委工作组在海子街 张耀居(112)
(二)我在五十年代末的一段经历 杨天模(115)
(三)我抓农村工作的一段回忆 彭奠基(118)
(四)造成三年困难的历史源由 杨永芬(122)
(五)治理威宁草海和大炼铜铁的回顾 冉泽林(125)
(六)对公共食堂的片断回忆 王祖槐等(129)

四、文献选录

- (一)毕节地委关于召开全体委员会议(扩大)向省委的报告
(1958年2月27日) (133)
- (二)毕节县委关于召开誓师大会情况向地委的报告
(1958年3月21日) (138)
- (三)毕节地委关于1958年度第二次全体会议
(扩大)情况向省委的报告(1958年4月25日) (141)
- (四)毕节地委工交部关于大力生产生铁问题的意见
(1958年5月4日) (149)
- (五)毕节地委关于召开1958年第三次扩大会议
向省委的报告(1958年6月12日) (151)
- (六)威宁县委给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全体干部和农业社
社员的一封信(1958年8月4日) (156)
- (七)地委办公室《卫星战况第一期：黔西县大炼钢铁战况》
(1958年10月20日) (158)
- (八)毕节专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一年
(1958年12月19日) (159)
- (九)中央关于反右倾思想的指示(1959年8月7日) (165)
- (十)毕节地区1960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报告(节录)
(1960年3月14日) (167)
- (十一)毕节地委关于纠正大跃进错误的情况(节录)
(1961年元月13日) (170)

五、大事记

- 附：“大跃进”运动时期歌谣、口号 (186)
- 后记 (191)

第一部份 综 述

主观意志必须遵循客观规律

中共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

发生在 1958 年至 1960 年的“大跃进”运动是我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次严重挫折和失误。“大跃进”运动是“左”倾思想指导下急躁冒进的产物。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使我国国民经济在 1959—1961 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人民遭受了重大损失。今天，我们对我区“大跃进”运动的史实及其留下的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予以追述和探究，无疑会给毕节试验区的建设以诸多的历史启示和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一、历史背景

1952 年底，毕节地区土地改革运动胜利结束。土改的完成，彻底摧毁了沿袭几千年来以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基础的封建剥削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加之互助合作运动的开展，极大地调动了我区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空前高涨，其它各项事业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据统计，全区 1952 年的工农业总产值由 1950 年的 25184 万元上升到 30863 万元，增长了 22.5%；粮食产量由 1950 年的 413130 吨增至 489920 吨，增长了 18.6%；财政收入由 1950 年的 260.7 万元上升到 588.4 万元，增长了 1.25 倍。全区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巨大发展，为 1953 年进入国民经济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社会主义建设打下了扎实的基础。之后，

全区人民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几年时间,于 1956 年基本完成了毕节地区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在党的“八大”正确路线的指引下,认真贯彻《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努力去完成我区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到 1957 年,全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1957 年同 1952 年相比,全区工农业总产值由 30863 万元上升到 56000 万元,增长率为 84.4%。其中,农业总产值由 1952 年的 28358 万元上升到 41478 万元,增长率为 46%,工业总产值由 1952 年的 2505 万元上升为 4522 万元,增长率为 80.5%;全区粮食总产量从 1952 年的 489920 吨上升为 711420 吨,增长了 45.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由 1952 年的 2833 万元上升为 7900 万元,增长了 1.78 倍以上;全区财政收入由 1952 年的 588.2 万元上升为 1674.4 万元,增长了 1.84 倍。1957 年,毕节地区呈现了经济稳定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各级党委、政府正确执行“八大”路线的结果。但是,面对全国呈现的大好经济形势和人民群众迸发出来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由于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不足,对经济的发展产生了盲目乐观的思想,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以及地方各级的不少领导滋长了骄傲自满的情绪。

1957 年 10 月,党中央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对反冒进作了错误批评。之后,经济工作中“左”的倾向重新抬头。同年 11 月,毛泽东在出席莫斯科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期间,提出了我国要在 15 年内超过英国的奋斗目标。根据八届三中全会批判反冒进的精神,11 月 13 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高潮》的社论首次提出了“跃进”的口号,成为“大跃进”的先声。之后,《人民日报》又相继发表几篇社论,继续批判反冒进。我区各县也相继开展了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为形式的全民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批判右倾保守,贯彻“跃进”精神。

1957 年冬到 1958 年春,全国广大农村普遍掀起了轰轰烈烈的

兴修水利、积肥、深翻土地等农业生产群众运动的高潮。面对已经逐渐升温的“跃进”形势，党中央于1958年1—3月，先后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指出反冒进给群众泼了冷水，泄了6亿人民的气。并指出：冒进是马列主义的，反冒进是非马列主义的。成都会议还正式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并提出一些过急口号，要求“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区的面貌基本改观。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我国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分析，错误地认为“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对1956年反冒进作了不公正的结论，并正式通过了“总路线”，为“大跃进”运动最后完成了理论准备。会议还批评了经济建设中所谓的“稳定派”、“观潮派”、“促退派”、“秋后算帐派”，提出要“拔白旗”、“插红旗”。“大跃进”运动便由酝酿发动进入了全面开展阶段。毕节地区也随着全国跃进形势的发展，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运动。

二、基本过程

毕节地区的“大跃进”运动从1958年初开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58年11月以前的“特大跃进”。经历了以兴修水利、积肥、造林、除“四害”等四大运动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跃进运动；以全民大办钢铁为中心的工业跃进运动；以及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第二阶段是1959年的“持续跃进”。其间，虽然经历了1958年底至1959年7月以前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和压缩工农业生产指标的过程，但各级的头脑却无法冷静下来，“左”的思想仍占统治地位，工农业生产指标高居不下。第三阶段是1960年上半年的“全面跃进”。八届八中全会后，全国上下开展了反右倾斗争，我区大跃进运动再次升温，从而导致了1959年底至1960年上半年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更为严重。工农业生产继续要求达到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求全面巩固和发展公共食堂，大搞全民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这一阶段的

“跃进”运动给国民经济造成了更大的破坏，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到 1960 年下半年，“大跃进”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实质上已经破产，被迫停止。

(一) 1958 年的“特大跃进”

1、“四大运动”揭开“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季，毕节地区同全国一样，掀起了以兴修水利、积肥、植树造林、除“四害”为中心的农业生产运动，揭开了毕节地区“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兴修水利是农业跃进的基础。为实现全区农田水利化，1957 年冬至 1958 年春，全区各县先后投入大量劳动力，开展了群众性的兴修水利运动，掀起了全民大办水利的热潮。截止 1958 年 4 月 15 日止，据称：全区完成水利工程 65885 处，扩大灌溉面积 3290783 亩，改善灌溉面积 629647 亩，水土保持 2857717 亩，防洪排灌 2401388 亩，有 30 个区 509 个乡 2801 个社实现了水利化，17 个区 297 个乡 1848 个社实现了梯田梯土化。

大积肥运动从 1957 年冬开始，一直到 1958 年夏季结束。大积肥运动声势浩大，实行全民总动员，男、女、老、幼齐上阵。全区各县认真执行了“五定”（定质量、数量、时间、劳力、报酬），“三结合”（集体积肥与个人积肥相结合，常年积肥与突击积肥相结合，积肥与制肥相结合），“一检查”（一天检查一次）的规定，采用和推广“熏、挖、造、蒸、沤、涝”等二十多种积肥办法。当时，猪、牛、马、羊等牲畜洗澡水、人体洗澡水、阳尘水都成了催苗肥料，“家粪满圈，矿肥出土，山肥下山，水肥上岸”成为大积肥运动的大写真。据资料称，截止 1958 年 4 月 15 日，全区共积肥 33665238 万斤，平均每亩耕地达 44827 斤。

群众性的植树造林运动也是大跃进的措施之一，1958 年春季达到高潮。到 4 月 15 日止，全区共植树造林 3289388 亩，封山育林 3505501 亩，据称，有 36 个区 599 个乡 3136 个社实现了绿化。

以除“四害”消灭老鼠、害兽、害鸟、苍蝇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在当时被视为 58 年农业跃进的主要措施之一，也是城乡爱国卫生运

动的中心内容。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城乡动员，全民参与，采取了“歼灭战”、“突击战”、“围剿战”、“扫荡战”等办法。可谓人人争当除“四害”能手，乡乡争创“四无乡”，呈现出一派大打除“四害”人民战争的宏伟场面。58年4月中旬，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取得了阶段性的突出战果，据资料称，消灭了麻雀24375971只，老鼠26173258只，害鸟9727435只，害兽367733只，共计60644397只；挖蛹272863斤，清除垃圾1473213万斤，新修和翻修厕所295502个，畜圈116814间，挖阴沟422527条，长2015741丈。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对改善我区城乡的卫生条件和促进农业生产的增收作了贡献，但是，除“四害”出现了乱捕滥杀的现象，一些益鸟益虫、珍稀动物也难逃厄运，遭受灭顶之灾，对生态的平衡产生了负面影响。

2、以片面地追求工农业生产高指标、建设高速度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普遍开展

全区“大跃进”运动是以工农业生产指标的不断加码而逐渐升温的。

1958年2月14日至24日，根据全国跃进的形势，地委召开了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毛主席关于“农业60条的指示”和省委第五次全会会议精神。会议提出了“苦战三年完成十年计划，基本改变我区经济贫困落后面貌，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40条，并且在同一时间内，使地方工业产值赶上农业产值水平”的战略口号，并确定了1958—1960年三年工农业生产的计划目标。农业目标是：力争到1960年全区粮食生产量达50亿斤，亩产达到900斤，1958年力争达到27亿斤，在57年的基础上增产60%。为实现上属目标，三年内必须基本实现农田水利化、梯土梯田化，完成土壤改良，用肥每亩万斤化，良种和农业科技推广普及化；畜牧业也要大发展，1958年要求每户养猪5头，到60年每户养猪达10头，三年内在威、纳、赫、水、大五县建立畜牧基地；林业上要求三年内基本实现绿化。工业目标是：全区工业产值要求在3743万元的基础上，三年内增长14.2倍，达到

5.7亿元，即从现在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4.9%提高到50%。为完成这个任务，地委号召各级必须坚持“全党办工业、全民办工业”的方针，上述工农业发展目标已经相当高了，但在1958年3月成都会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之后，地委在4月11—19日召开了1958年第二次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了成都会议和省委六次全会精神，根据全国、全区日益发展的“跃进”形势，制定了毕节地区1958—1960年工农业发展规划的两本帐，工农业生产指标被调高。工业上，第一本帐是：1958年新建厂矿35580个，总厂数达到35653个，产值15150万元，比1957年增长5.18倍，占工农业总产值的35%；1959年新建厂矿201个，总厂数达35854个，产值为3.75亿元，比1958年增长147%，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5.5%；1960年新建厂矿117个，总厂数达35971个，产值6亿元，比1959年增长60%，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1%。第二本帐是：1958年新建厂矿67976个，总厂数达68049个，产值25849万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42%；1959年新建厂矿10420个，总厂数达到74433个，产值4.980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1%；1960年新建厂矿6156个，总厂数达到80589个，产值8.7233亿元，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9.6%。为完成上述计划，地委要求，各级必须实行边干边学，敢想、敢干；加强领导，迅速拉开摊子；坚决贯彻省委提出的“抓、钻、放、协”等四个中心环节。在农业上，第一本帐是：1958年粮食总产必成数为20.19亿斤，比1957年增产20%，亩产达446斤；1959年必成数为32亿斤，比1958年增长58.5%，亩产达707斤；1960年必成数为40.7亿斤，比1959年增产27.2%，亩产900斤。第二本帐是：1958年力争达到30.038亿斤，比1957年增产79.6%，亩产达664斤；1959年力争达到375039万斤，比1958年增长25%，亩产847斤；1960年力争达到454692万斤，比1959年增产21.2%，亩产1059斤。要完成上述农业生产任务，地委号召，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步步跟上，一步不让；坚决采取“早、深、肥、密、改”五项增产措施。在当时，尤其是把深翻土地、高度密植作为提高粮食产量的最佳途径。1958年5月，

“八大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我区掀起了宣传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和总路线的热潮，结合全民整风运动，批判了“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号召“插红旗、拔白旗”，之后，经地委常委会议决定，我区1958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上调为50亿斤。8月中旬，为了同全国各省粮食都要翻番的形势呼应，1958年粮食生产指标再次被人为拔高，由50亿斤改为60亿斤，并号召力争实现80亿斤，成了可想而知的天文数字。

各级人为地不断追求和拔高工农业生产的指标，标志着我区“大跃进”运动已经普遍开展起来。

3、密植、深翻夺高产，农业卫星满天飞

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最主要的是解决粮食问题。为了实现粮食产量的跃进翻番，全区在1958年的农业生产中，大力推行深耕十密植十肥料=高产的理论，各地都把高度植密和深翻改土当成是实现农业增产的最主要技术措施，并在1958年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农作物高度密植和深翻改土的农业生产运动。

“合理密植”本来是全国推广的农业生产中比较好的经验，也是“农业八字宪法”所要求的。但在跃进的狂热形势下，却变成了“高度密植”，并越演越烈；变成了“越密越好”。1958年春季，地委把省委提出的“早、深、肥、密、改”五项农业增产措施作为农业生产的春耕之纲，要求全面实行水稻三角丛植，包谷的双株密植，做到满插满栽，其中水稻种植要求每亩种植50000窝以上，每窝5株；包谷种植要求6000窝，每窝3株。4月，地委号召全区各县全面推广金沙县贯彻“早、深、密、肥、改”，“苗出、苗全、苗壮、苗旺”的四条措施，要求全区开展群众性的补苗、追肥和消灭三类苗运动，以达到“苗全、苗壮、苗旺”之目的，为农业生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到1958年秋季，地委普遍要求各级对高度密植进行田间鸣放辩论，号召推广小季农作物的三角丛植、双行密植、三行密植技术。地委还决定在毕节城关灯塔人民公社搞一亩密植高产12万斤的小麦和一亩高产5万斤的油菜试验田。其中，小麦试验田要求下种500斤，实行厢播，成穗率要求

1800万穗；油菜试验田要求实行宽幅条播，每亩种植40000株。各县积极响应地委号召，纷纷进行密植高产试验。为了达到高度密植，1958年的小季全部改点播为宽幅条播，小麦平均每亩用种35斤左右，丰产地达60斤，卫星地达70—80斤；油菜条播行距6寸，播幅5寸，每亩用种达2斤；洋芋用种每亩600斤，高的达1000斤以上，保证亩栽16000—22000窝，其他杂粮也相应进行密植，为了做到满栽满插夺高产，地委号召各县、社、队要见缝插针，把零星空地、五坎（田坎、地坎、沟坎、塘坎、路坎）、四旁（沟旁、塘旁、路旁、宅旁）全部种上粮食作物。“高度密植”，而且“越密越好”，这是严重违背农业生产客观规律的作法，违反科学，造成了粮种和劳动力的巨大浪费，不但达不到增产目的，反而是徒劳无益，“多种少收”，“广种薄收”，造成减产。

“深翻改土”是农业增产的一项“有力”措施。1958年秋、冬，我区各县掀起了一场群众性的深翻土地运动。地委、行署号召组织百万劳动大军大闹深翻，决不让板田板土过冬。之后，各县、社、队纷纷建立深翻指挥部，实行定期检查对比，书记挂帅，开展插红旗、树标兵的劳动竞赛和深翻大协作，到处呈现出一派战天斗地的场面。白天是红旗招展，干劲冲天，歌声、喇叭声、口号声响彻田野，夜间则灯火齐明，夜战不息。人们“跃进”的情绪很高，喊唱出许多振奋人心的口号和歌谣。如“革命加拼命，拼命翻土地”、“苦战十月搞深翻、人马出动战得欢，板地深翻二尺五，明年粮食翻几番”、“战天斗地，向土地要粮”等等。运动中，搞大兵团作战，实行“六化”，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运输车子化、耕种新式农具化、托儿所化。并实行“十三下田”，即食堂、医院、商店、剧团、宿舍、办公室、电灯、电话、广播、托儿所、报社、政治、保卫十三下田。在深翻运动的高潮中，各地出现了许多深翻书记田、干部试验田、青年试验田、老年试验田、妇女试验田，涌现出一批“英雄连”、“花木兰连”、“黄忠队”、“红旗队”，土地的深翻程度也不断加码，被认为是“越深越好”。一般田土达1.5尺左右，试验田、卫星田达2—3尺，在相互攀比的风气下，有的地方深翻

达 6—7 尺,更有甚者到 1 丈 2 尺。这些作法,适得其反,劳民伤财,对农业生产是一种大破坏。

在高度密植、深翻改土的农业生产运动中,各地不断地批判右倾保守和反冒进,批判“算帐派”、“条件论”、“定局论”,对粮食产量进行鸣放辩论,认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鼓吹“没有万斤的思想,就没有万斤的粮食”,只要发挥了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就可以有呼风唤雨的力量,就会创造出任何人间的奇迹来。因此,农业战线“捷报”频传,“高产卫星”层出不穷。据档案资料称,金沙县沙土区压西风社创造了水稻亩产 9997.5 斤的全区最高记录;金沙县沿河乡的一亩红苕,亩产 102520 斤;威宁县严家乡的八分地,创造了亩产洋芋 12.6 万斤的全区最高记录;威宁县大寨社创造了荞子亩产 4926 斤的奇迹,大方县六龙乡放出了烤烟亩产 11700 斤(干叶)的高产卫星;金沙县石路乡创造了花生亩产 5411 斤的高产记录;威宁县金钟区夸都乡佛手瓜生产放出了平均亩产 20 万斤的大卫星;毕节县试种甜菜,创下了平均亩产 8.4 万斤的高产记录。到 58 年底,毕节地区放出了粮食总产量 39 亿斤的农业重型卫星。在农业生产大放卫星的同时,畜牧业、林业也放出大卫星,全地区生猪达 300 多万头,耕牛达 67.6 万头,马匹达 13 万匹,羊达到 61 万只,植树造林达 459 万亩。

4、全民大炼钢铁,把“大跃进”运动推向高潮

1958 年 5 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运动在毕节全区普遍开展起来。随着工农业生产和各项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机器设备、钢材和农具需要有很大的增加,因而我区生铁生产已大大不足需要,为此,根据省“钢铁生产专业会议”的要求,我区于 1958 年 5 月发出了《关于大力生产生铁问题的意见》。《意见》指出至 5 月 20 日,全区计划新建铁厂 211 个、炉子 385 个,但现只有 88 个厂 62 个炉子投产,这和要求相差甚远。《意见》确定了 1958 年全区生铁生产任务为 50000 吨,为完成这一任务,地委指示:一是积极修建土炉,力争 6 月底将计划筹建的 323 只炉全部建设投产;二是在全区范围内掀起一个技术革新运动,解决技术力量,提高冶炼水平;三是大力推广无烟

煤炼铁的先进经验以弥补木炭、焦炭不足的困难；四是各县必须加强对生铁生产的领导。并提出“赶赤水，追四川，力争超额完成全区生铁产量 40000 吨”的行动口号。为了加强对钢铁生产的领导，6 月份，毕节专区成立了钢铁办公室，各县也相应成立钢铁办公室，领导各县的钢铁生产。至此，我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运动普遍开展起来。7 月份，各县根据省委粮钢同时并举的方针和响应地委提出的“大战七月，苦战七月，七月是建炉关键月”的号召，很快掀起了全党全民性的建炉高潮。到 8 月上旬，全区已投入生产的土炼铁炉 484 个，已建成未投产的土炼铁炉 17193 个，在建的 3055 个；已生产生铁 8173 吨，土钢 30 吨。8 月 7 日，地委向全区转发了《大方县大办钢铁的十条做法》，要求各县认真学习和推广。8 月 9 日，地委发出《关于工业生产方面的情况和今后的意见》，把我区 1958 年生铁生产指标大幅度上调，提出了“保证 30 万吨，争取 50 万吨”的口号，并力争 8 月份产铁 5 万吨，9 月份后，每月要求产铁 12 万吨。为此，地委决定把 8 月作为“技术突击月”，掀起了一个大办钢铁的技术革新运动，使钢铁生产实现“六化”，一是实现滑轮、滑槽、滑丝、滑车化；二是实现运输车子化；三是实现土机械鼓风化；四是实现卷扬提升化；五是实现鼓风热风化；六是劳动组合合理化。地委还号召开展群众性的“工业抗旱”运动，发动群众献废铁、废钢、废铜，变废为宝，为全区钢铁生产作贡献。

1958 年 8 月 17 日至 30 日，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对农业生产形势作了过高估计，认为粮食问题已经解决，要求各省、自治区党委把重心从农业转到工业方面来，会议正式决定和公开宣布 1958 年钢的产量要比 1957 年翻一番，即达到 1070 万吨。在北戴河会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运动达到高潮。9 月 10 日，地委召开电话会议，要求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大办钢铁，苦战 5 昼夜，以保证钢铁生产任务的胜利完成或超额完成。12 日，毕节地委接省委特急电，对原来生铁调拨计划作了调整，地委要求各县认真完成 9 月份全区上调省生铁 17000 吨的任务。9 月 30 日，地委召开会议，对全区钢铁生产作了进一步的安排部署，号召全区打好 10 月份以后的“三大战